

评曹阳著：

《历史的选择——市场经济发展史》

陈银娥

青年经济学家曹阳副教授的新著《历史的选择——市场经济发展史》(以下简称《史》)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发行。《史》从一个新的角度首次系统地探讨了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丰富了我国经济理论界对市场经济问题的探讨。该著作为我国第一部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论著,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史》以唯物史观来分析 and 认识市场经济发展史。市场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反映了人类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征服、改造自然,为人类自身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它不以任何社会制度为转移。作者以大量材料为基础,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即“神奇的法术”之所在,从而说明了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作者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联系不同历史时代的特定条件来阐述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历程,将对市场经济的分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最终证明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包括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我们的最终选择。

第二,《史》在结构体系上将分析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机地统一起来。

首先,《史》概括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全

部过程:市场经济从自然经济冻土里崛起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表现是,它一产生就受到国家管制,市场经济只能是戴着枷锁跳舞。亚当·斯密解放市场的呐喊,使市场经济“神奇的法术”得以施展,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得以发挥。但是,市场经济并非“伊甸园”,它充分自由的发展给社会经济带来了风险与波动。因此,对市场的矫正就是逐步确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即由国家的不予干预市场到国家干预市场再到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在经济理论上则是从斯密“自由放任”及“萨伊定律”到凯恩斯革命、再到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这种市场的矫正使市场经济在竞争中走向繁荣,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奇迹”的奥秘之所在。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理论的误区导致了实践的歧途: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既形成了“短缺经济”即微观经济的低效率,又造成了“计划失衡”即宏观配置的大浪费。这是忽视市场和价值规律、从而严重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实践的沉痛教训使社会主义国家发出了找回市场的改革呼声。这个重新发现市场的艰难探索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换来了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在饥饿中逼出来的改革,

市场机制引发的农村发展奇迹，导致了中华大地的“第二次革命”。但是，双重经济体制并存产生的摩擦与无序表明，中国的改革不是“过头”而是“不足”。当我们从发展市场经济是姓“社”姓“资”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时，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并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当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史》的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体系，它说明了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历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同的。

其次，《史》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发展史：市场经济从自然经济中产生，经过了漫长的曲折发展历程。作者说明了各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曲折性，但是，无论多么曲折，市场经济却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管制”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都不能阻碍、限制市场“神奇力量”的发挥，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市场”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找回市场”，都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史》的分析研究范围覆盖古今中外有关的市场经济理论、政策与实践。从总体来看，无论是西方经济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它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力量的认识都是由主观、片面逐步走向较为客观、全面。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关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上面。西方理论首先是主张实行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放任”，由“看不见的手”来建立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这就是斯密的市场自动均衡学说和“萨伊定律”。由于无政府状态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大危机，西方理论转而反对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市场，但不是回归到国家管制市场，这就是凯恩斯理论。当国家过分干预市场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造成了“停滞膨胀”时，西方理论进而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张国家宏观调控市场，这就是市场与国家再定位的凯恩斯革命的再

革命。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新的“繁荣”，并创造了新的“奇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关于市场与国家（中央计划）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曲折过程。在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矫枉过正的批判，逐步形成了计划取代市场的构想，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对市场机制理论上的否定导致实践中限制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集权式计划化，“国家迷信”（这是国家权力膨胀的根源）和权威形成的计划完全代替了市场，市场经济在痛苦中呻吟，社会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奇迹来自市场经济的“神奇的魔术”，于是，社会主义各国开始了重新发现或找回市场的改革。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这就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由市场机制引发的农村发展奇迹和乡镇企业“静悄悄的革命”到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建立在自觉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市场也受到计划的宏观调节，计划与市场逐渐有机地结合或统一起来。双重经济体制并存所表明的“改革不足”，在破除了姓“社”姓“资”的困惑之后，我们才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利用价值规律、竞争机制和计划指导，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正确处理市场与国家关系的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它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革命。

第三，作者在《史》中不仅考察市场经济发展史、市场经济理论史，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为依据，从比较中说明了社会主义最终选择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作者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①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②社会主义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因为在当今世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创造出高效的劳动生产率；”③④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它对法人企业、劳动力所有者（个人）都是客观存在的。④“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国家必定是法制国家”；⑤⑥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要求是“实质性”地转换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企业各自的职能，互不侵权、越位”，“反对国家垄断，反对国家管制，摒弃无所不包的‘大计划’。”⑦其中心环节在于“重新塑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经济主体。”⑧其关键是“尽快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⑨，而要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一个重要的前提条

件是建立起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承担起一定的共同抵御风险责任，以缓解市场经济的风险；同时以法治经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摒弃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企业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并不是说不要经济秩序。“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必须以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经济法规为基本保障，依法而不是依人治经济”，⑩因为，“以企业自由为基础的经济民主和以法制为规范的经济秩序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⑪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使国家繁荣、人民富裕，我们通过艰难的探索终于重新选择了市场经济，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走向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最为普遍的（但不是唯一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最终选择市场经济是一明智和正确的选择！市场经济是走向富裕之路，走向繁荣之路”！⑫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曹阳：《历史的选择——市场经济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230、230、228、229、231、231、231页。

（责任编辑 刘传江）

（上接第78页）审计目标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这种审计方式的深入发展，审计科学中专门用于企业内部控制部分的理论和方法大大丰富起来。尽管建立内部控制系统是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但审计人员有责任对其是否完善进行评价。从而，又有效地促进了内部控制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第三，统计抽样技术的推动。由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业务量的日益增加，19世纪末英国首先使用了经验判断抽样审计。40年代末，统计抽样技术开始萌芽，进入70年代后，统计抽样技术在审计工作中已

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健全与可靠已经成为能否成功地应用抽样技术的先决条件。如果企业内部控制愈健全，经济业务处理就愈合理，会计记录就愈可靠，那么，样本的抽取也就愈少，就可以根据少量的样本对全部经济业务事项作出评价。如果内部控制系统不健全，那么，存在的控制风险就愈大而审计风险也就愈高，因此，审计人员就要相应扩大抽查范围和增加样本量，以减少这种风险避免引起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 余玉苗）